

21 世纪年度散文选

2010

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 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21 世纪年度散文选)

ISBN 978 - 7 - 02 - 008337 - 4

I. ①2… II. ①人…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5635 号

责任编辑:杜 丽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董文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3 千字 开本 88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75 插页 2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8337 - 4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我社自一九八〇年起,曾经编选和出版过《1980—1984 年散文选》、《1985—1987 年散文选》、《1988—1990 年散文选》和《1991—1993 年散文选》,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一九九四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进入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仍然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成为文学园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了及时总结年度散文创作的实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散文作品,进而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我社决定恢复年度散文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恢复出版的散文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散文选”,每年编选一册。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入选篇目以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此项工作得到了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提出了很好的编选意见,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不仅能了解本年度散文创作的总体概貌,而且能集中欣赏和阅读这一年里出现的最优秀的散文作品。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真诚地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再回兴义忆耀邦	温家宝 (1)
纪念沈从文	叶兆言 (6)
青春纪事	肖克凡 (12)
浓荫掩隐	刘学刚 (21)
联合国餐馆	何 杰 (33)
记忆里西陵峡的三个小地方	杜 鸿 (41)
东瀛记	唐翼明 (51)
日常用语说来由	聂鑫森 (59)
苦行者	孙 郁 (67)
戏人	胡竹峰 (85)
元大都寻梦录	从维熙 (94)
闲笔	朱以撒 (100)
我和父亲季羨林	季 承 (108)
莲生水中	韩开春 (115)
城市里的吆喝	素 素 (127)
一棵树能站多久	耿 立 (131)

如果·爱	郑春红 (136)
还乡	范晓波 (144)
动物邻居	小米 (156)
没有你,我将干枯无倚	
——纪念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	吴福辉 (163)
今天怎样看帝王之爱	雷达 (172)
三苏祠下	沈荣均 (176)
磨坊目击记	张承志 (185)
大地静美	周伟 (191)
骆驼之死	王族 (201)
来一碗	第广龙 (207)
那阳光下蒲公英的清香	高文献 (213)
晏阳初在定县	艾云 (217)
爱的哲学(外一章)	范曾 (257)
人是无限多个欲望	辛文婧 (265)
俺村、中国和欧洲	刘震云 (269)
烨·一九七九·耀眼的火光	范玮丽 (275)
《古炉》后记	贾平凹 (292)
丹青二月河	周同宾 (301)
遗失在美国的日子	郭文斌 (305)
俯身读草	冯源 (323)
同里记	汗漫 (332)
致石涛书	冯唐 (346)
四十年前的爱情(外二章)	袁山山 (350)
儿子是“大哥”	卜广胜 (364)
萧红的城市	阿成 (376)
倔强的斗士	
——回忆和满子兄相处的日子	顾征南 (380)

她灿烂而去	黄育海 (394)
雁山瓯水	余光中 (401)
父亲的一生(节选)	熊景明 (414)
寻找梁漱溟墓	李登建 (440)
种树小记	于 坚 (448)
十二生肖	周友斌 (452)
乐读记	李书磊 (466)
珠落玉盘·端午	范 婉 (471)
对视台湾	陈应松 (487)
孩子即将丢失(外一章)	赵 瑜 (508)
画师	庞 培 (520)

再回兴义忆耀邦

温家宝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

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夜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

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 21 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 年 10 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 年 1 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 年 4 月 8 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 月 15 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 年 12 月 5 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原载《人民日报》2010 年 4 月 15 日)

纪念沈从文

叶兆言

关于沈从文先生,有许多话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姑姑快退休了,忽发奇想要写电影剧本,说写就写,是写画家司徒乔。我至今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反正是兴冲冲地写了,写完,也没地方发表,更谈不上谁愿意拍摄。完全自娱自乐,就在自家传阅,每个人都翻一遍。我伯父建议姑姑去和沈从文谈谈,听听他的意见,因为沈与司徒乔的关系非同一般。姑姑说,她又不认识沈先生,怎么可以去贸然见人家。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沈从文与司徒乔是好朋友,沈是一个很侠义的人,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他以好友身份专门赶到出事地点,向朋友们报道事发经过。大家都知道沈从文与当年在北京的一帮文化人关系不错,知道他与胡也频和丁玲有着非同寻常的交情,这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与司徒乔,如果伯父不提,我还真不知道。

伯父形容沈从文说话的神情,与钱锺书小说《猫》描写的曹世昌还真有些像,举动斯文,很小心翼翼的样子,是悄悄地告诉你,仿佛在透露十分秘密的消息。他柔声细语地对伯父说,他的家乡凤凰非常漂亮,真的很漂亮,如果有可能,应该去一趟,好好

地看一看。伯父比沈从文小十多岁，因为祖父的关系，当然是与沈认识，不过他觉得自己毕竟晚辈，还不够资格从中引见介绍，非得老爷子亲自出马才行，但是祖父未必就肯做这样的事，沈从文为人一向认真，对于一个认真的人来说，轻易不能麻烦。于是不了了之，事实上过了不久，姑姑的电影热情也消失了，玩票就是玩票，当不了真的。

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老作家章品镇跟我说过与沈从文有关的另一个故事。大约文革前，沈从文到江苏来，考察什么文物，章向其求字，他迟疑着答应了，说容他回房间再写。章以为只是敷衍，很多能写字的人都是这么推托，没想到第二天，他竟然用小楷抄了一大段文字。这事足以说明沈从文的实在和认真，我看过他给王伯祥之子王湜华写的字，也是整篇都写满了，数一数，竟然有几百字，一个人老是这么给人题词，非累死了不可。

很多文化人去凤凰，都冲着它是沈从文的家乡，起码我就是这样。凤凰古城漂亮，湘西的风景迷人，如果没有沈从文，一定会大大逊色。2000年秋天，清澈亮丽的沱江边，我在沈的墓前久久徘徊，不远处，有一块他妻子张兆和写的铭文，字数不多，让人无限感慨。我没有带相机，也无纸笔，就反复看，当时记住了，现在却写不出来。大意是沈从文死后，大家如此隆重，无非锦上添花，而沈生前矛盾重重，诸多坎坷，却很少有人雪中送炭。

1949年，祖父到北京没几天，便去看老朋友沈从文。见面的结果让祖父很失望，虽然他们也“杂谈一切”，但是沈从文的恍惚，不近人情的多疑，明显的精神失常，让祖父感到揪心之疼。就在这次见面的一个星期后，沈从文用剃刀将自己的颈子割破，两腕的脉管也割伤了，还喝了一些煤油，幸好是在大白天，抢救及时，生命才得以保存。这段惨痛往事，很长时间都被深深埋藏，后来被人重新提起，基本上都是从政治迫害这个角度入手。

政治上的迫害不容置疑,但是面对同样的压力,很多人都若无其事挺了过来。朱光潜被定性为蓝色作家,萧乾被定性为黑色作家,相比较而言,被定性为粉红色作家的沈从文,罪名似乎要更轻一些,这一点不仅我今天这么看,在当年,沈从文的儿子也是这么认为,他甚至还因此安慰过父亲。别忘了沈从文是从乱世里走出来的,早在还是一个毛孩子的时候,他就当兵了,见识过杀人如麻的场面。别忘了他是性格倔犟爱吃辣子的湖南人,出生地湘西以民风剽悍而闻名,说他仅仅因为害怕才自杀,这实在是小看了沈从文。

时至今日,重新说到沈从文,不妨有些医学的观点和态度。从现有记录资料来看,当时的沈显然患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也就是眼下人们常说的抑郁症。他的不安宁并不是持续的,一会清醒,一会糊涂,“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

有时候事情非常简单,有时候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张兆和的话,作为沈从文的妻子,她也觉得当时的压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认为他只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压力大小很难判断,不同的人,承受能力肯定不同。有一段时间,我十分在意这方面文字,着重研究沈从文 1949 年前后的心路历程,并不想得出什么结论,而是希望能够多些观点,多些角度,在不可能中寻找一些可能。

事实上早在 1949 年之前,沈从文的写作就遇到了严重问题,所谓个人发展的瓶颈。以小说水平而论,1934 年出版的《边城》是巅峰之作,这以后,基本上陷入了拔剑茫然的境地。到了 1942 年的《长河》,虽然有所突破,但是作为小说名家,他的个人影响力正在减弱,读者关注度明显减少,这固然与抗战的文学大背景有关,也与小说的深度分不开。说老实话,尽管沈从文的小

说写得很好,但从来就不是个自信的作家,他有足够的勇气,有农夫默默耕耘的写作耐心,对未来却并不看好。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原因,与留洋的大教授相比,沈从文工资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一个教写作的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没什么出路,遭人白眼也属正常,沈从文赖在大学里,也就是杜甫“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的意思,偏偏最后连这个也难以继。众所周知,通常情况下,当职业作家是养不活自己的,在1949年,沈从文对前程的最大担心,显然不是能不能写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折磨已久,也就不再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而是还能不能继续在大学里当老师,还能不能活下去:

“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这是沈从文当时发出的最惨痛声音,生存的恐惧把他彻底给压垮了,多少年来,沈从文都是以退为攻,可是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地方可退。1949年是道很高的门槛,很多人跨过了这道门槛,都会感到无路可走。有人看到了希望,不过这希望和绝望异曲同工,结局都差不多。这其实是一代作家所面对的共同难题,简单地说,沈从文只是比别人更不善于应变,在与时俱进方面,他的能力孱弱了一些。五十步千万不要笑一百步,那些具备应变能力的作家难道就写出了好作品吗?答案同样也是没有。

回顾过去的历史,我的耳边总是回荡着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声音,“一个真正的作家是拦不住的,如果被拦住了,他就不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给为什么不能写作找出一个理由,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要是不写作,就永远会有充足的借口。我一直会有些不太切实际的联想,如果当时给了沈从文写作机会又能怎么样,如果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能怎么样。把责任都推给社会,把过错都归于环境,显然太过于简单,太外

行。写作说到底,是写没写,而不是让不让写。冤有头债有主,怨天尤人怪罪社会,并不能最后解决写不写的问题。小说史从来都是只关心那些写出来的文字,世界上一流作家的作品被查禁屡见不鲜,不合时宜有时候恰恰就是好作家的标志,写《尤里西斯》的乔依斯一生都不得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当时也不可能在苏俄出版。

据说沈从文是中国作家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事实上就算获得了这个奖项,也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真正的快乐。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一吐为快,是把内心深处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只要这个愿望不能完成,只要写作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作家的良心就不可能获得安宁。奖励永远是外在的,有时候可能还会帮倒忙,如果在文革前,诺贝尔奖只会给沈从文带来帕斯捷尔纳克所遭遇的同样痛苦,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华工具”,成为当时国家的“叛徒”。如果是文革后,又可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官拜高位,成为文坛的盟主。即使是没有得这个奖,风烛残年的沈从文最后也是苦尽甘来,享受到了“部级”待遇,配备了汽车和司机,所有这些,对于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沈从文此生最大的寂寞,是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再写了,他尝试着各种努力,有劲使不出来,最后只好壮士断臂忍痛放弃。好在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退路,这就是文物研究,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沈从文来说,不过是完成了另一件功德圆满的善事。沈从文的意义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努力去做一件事,只要真努力了,就有可能做好。有时候想想,写小说真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不着把它吹捧得太高太玄乎,小说说到底也就是小说。在给汪曾祺的信中,沈从文说拿破仑是伟人,我们只能羡慕,学不来,可是像雨果和托尔斯泰那样,想效法却不太难。